

国际移民、社会科学和公共政策

劳尔·乌尔苏亚

当前在许多国家,国际移民不可避免地占据了公共议事日程的一席之地。这一现象的普遍出现无疑是在 20 世纪末叶,现在却已经改变了方向。而且,原来的公民和后至的移民之间在民族、宗教和文化方面的差别已经导致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上述种种因素把国际移民推到聚光灯下,唤起了公众的关心,而移民的接受国则试取若干政策,以期消除或至少是减少这种短期及至中期内看来不可能改变的潮流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如人们预期的那样,国际移民活动在政治上的意义吸引了人口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注意。尽管他们对此感到兴趣且因此兴趣而进行了一系列研究活动,国际组织的有关政策

建议以及各国所采取的政策却往往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因为它们用以为根据的对该问题的界定若非错误便是有缺欠。

本文意在辨识国际移民对社会科学提出的若干挑战,以期社会科学家能对移民问题的决策发挥较大的作用。我将首先勾勒出国际移民的大背景,接着举例说明对这一问题的错误界定。然后从研究者、专

家和决策人员之间的交互关系着眼,探讨若干较为一般性的问题,并对如何加强这些交互关系提出一些可供实用的建议。

当前的国际移民

看来,我们若要研究国际移民便不能

不把日益加速的全球化一并加以考虑,这种情况与各个社会当前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如出一辙。但是如所周知,某个术语之广为运用未必就意味大家对它的含义已有明确的共识。全球化属于这种情况,它的定义需要细说。

就本文的探讨而言,全球化乃是一种多维过程,有如下的特征:

全世界共同接受一套经济规则,以求经由市场和生产的普遍化而达到利润和生产率最大化,通过提高各国国民经济的生产率和竞争性以获得各国政府的支持;
以灵活性和应变能力为核心,促进技术创新和组织结构变化;
扩大以信息为基础的特定社会组织形式,这种形式的社会组织本身成为生产

劳尔·乌尔苏亚 (Raúl Urzúa) 是社会学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共政策委员会主席,智利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社会政策研究计划协调员。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变化与公共政策之间的联系,最新专著为《民主治理的断裂》(与 Felipe Aguero 合著, 1998)。通讯处: Professor Raul Urzua, Diagonal Paraguay 265, Santiago, Chile; Email: rurzua @ abello. dic. uchile. cl

率以及权力的来源；
削减福利国家体制，促进社会服务业私有化和劳资关系灵活化，削弱工会；
把国家对种种经济政策工具——诸如货币政策、利率和财政政策等等——的控制实际上转交给若干跨国组织；
共通的文化价值观得以扩散，但与此同时有民族主义、文化冲突以及各种社会运动再度兴起。

但全球化并不是具有普世性的惟一一种过程。如巴巴新近向我们指出的那样，人权这种同样重要的过程也在普世化：

如果说全球化的范式往往突出跨国的剥削和统治制度，从而破坏民族国家干预和保护的能力，那么，人权范式则突出了在国际领域赋权的可能性。各项国际公约中包含的普世性规范和可以实施的最低标准提供了必要的机制，可以限制国家权力、超越国家和地区的特殊性，以及冲击国家结构而强制实施具有国际性约束力量的各项人权。

在我们建立起得到国际上普遍接受的组织系统并要求实施国际上普遍承认的人权之前，确实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是，当代的各个民族国家制订各项政策之时，显然已经不再能够置基本人权于不顾。

全球化与人权的结合对国际移民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为在这一领域从事研究工作的社会科学家以及政府决策人员所不可忽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探索当代国际移民原因的理论往往强调国际移民和全球化的全部或某些方面之间的联系。同样，国际组织的有关政策建议之中也颇有一部分认为，只要采取和实施相应的政策，消除或至少是减少国家之间的差异，国际移民的数量就会下降。这种差异有可能是全球

化所造成，或至少是因全球化而加重。但无论从理论或政治的角度看，移民所离去和投奔的两国之间对人权的尊重程度无疑影响着移民的动机和最终迁徙的决定。接受移民的国家有义务尊重移民的权利，否则就会受到道义上的责难，甚至有遭政治制裁和在国际上被起诉的风险。

总起来说，针对当前和未来国际移民潮流的政策必须顾及两个方面：一是全球化的进程，它已经使得世界各国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领域发生急剧变化；另一是种种现存的伦理规范和法律准则，它们对个人和群体一概给予保护而不问其国籍、种族、民族、宗教或政治信仰等情况。

要进行这样的分析研究，社会科学家将会遇到困难。事实是，全球化是一种多维度的过程，而移民过程在迁出和迁入国所呈现的因与果不可能仅就单一的一个学科来加以分析。不同学科进行概括和解释的过程及其对政策的影响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出入，而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又无不企图对公共政策施加影响，于是此矛彼盾，出现纷争。这样的权势之争无疑妨碍社会科学家们充分理解眼前的现象，从而难以在提高政策质量方面发挥作用。

这一点姑且留待下文。现在先就贫困与移民之间的关系着眼，列举社会科学家为应对国际移民潮的挑战而须加以考察的若干问题。

国际移民与贫困

每逢言及国际移民活动、尤其是发展中和发达国家之间的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时，有关的会议和国际组织总是强调贫困以及移民迁出和迁入国之间的收入差距。于是，发展中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移民活动就被视为这些国家之间的、以及迁出国家

内部的收入差距日渐增大的结果,而这种差距及其后果则认为是全球化进程的一个部分。这个命题之广为人们所接受的一个例子,是国际人口和发展会议行动纲领第十章第 10.2 条;按照它的建议,为防止从最不发达国家到发达国家的大规模移民活动,一项适当的政策便是减轻贫困。

鉴于这个会议的重要性及其广泛影响,我们有理由提出疑问:当前全球的收入分配和贫困情况二者的趋势是否与这个建议相一致?以其权威性知名的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 1999》就此提供了大量资料。下面按本文的论点所需,就中指出以下几点:

1. 人均收入仍然低于 10 年之前或更早的国家为数达 80 个以上。

2. 国家之间的差距已愈来愈大。在最富国生活、占世界 1/5 的人口与在最贫困国生活、占世界 1/5 的人口这二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已从 1960 年的 30:1 上升为 1990 年的 60:1,又再上升为 1997 年的 74:1。

3. 及至 90 年代晚期,在最富国生活、占世界 1/5 的人口计占:世界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86%,世界出口市场的 82%以及外国直接投资的 68%;而在最贫困国生活、占世界 1/5 的人口在以上三项中所占份额分别仅为 1%。

从这些数字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当前趋势不应该限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移民。如若贫困和移民活动之间真正存在一种线性关系,则反映着贫困和收入状况的这些以及别的一些数字就应当促使最贫困国家的外迁人口大大增加。

联合国人口署根据各国在 90 年代进行的人口普查所获数据,对移民人口做出了不大一样的估计。90 年代在出生国以外生

活的人口虽然达到 1 200 万,在同一时期全世界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却仅为 2%。而且,1965—1990 年期间全世界移民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1.9%)较之同一时期全世界人口总数的增长率(1.8%)仅仅高出 0.1 个百分点。换言之,90 年代早期的国际移民仍然是一种个别的现象;就全球范围逐年看,移民趋势并无任何重大增长。

联合国人口署的估计数字可以令人对移民情况较为安心,但还不足以去否决或赞同关于全球收入分配和贫困的现状导致国际移民增长的假说。这些估计数字不仅涉及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移民活动,而且也包括同一类型国家之间的移民活动。就此言之,移民情况看上去的稳定掩盖了移民流的方向变化。事实是,据联合国的同一个研究报告称,入境移民达到全国人口 15% 或以上的国家已从 1965 年的 34 个上升为 1990 年的 52 个,从而可见国际移民的归宿地较之过去大为集中。另一方面还应当注意到一种情况:欧洲国家从 19 世纪直到大约 20 世纪中期一直是国际移民迁出国,如今成为移民迁入国,而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等传统的移民国家却依然继续接受移民。流行的俗话会说,过去是北人南迁,如今风水一转,变成了南人北迁了。

世界北方和南方的收入贫富悬殊,似乎证明贫困真是国际移民的主因,从而意味着贫困愈甚则移民愈多。但这个结论却不见容于就此问题进行的不少研究所获得的证据。新近进行的一项研究在广泛的基础上修订了此前就此问题进行的调研结果,并以经济计量分析方法把移民出发国的收入水平和向发达国家的移民率二者相联系,得出结论说:“极端的贫困有效地阻碍了国际移民。因为十分贫穷的人们根本没有迁徙出国的财源和社会资源。但一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国际移民的倾向就明显

增加,这是因为有关的人家已有能力选择国际移民作为分散经济风险的战略。而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移民倾向就相应下降。”

实际上,就专门研究移民理论的社会学家来说,这个结论毫不令人意外。如多项经验性研究证明的那样,国际移民劳工是来自中等发展水平国家的较低和中等收入的阶层,而不是来自最不发达国家的社会下层。

贫困与国际移民之间并无直接联系,这一事实质疑了降低贫困就会降低由南而北的移民的说法。毋宁说它包含另一种意思: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较为贫困的国家,从那儿来的移民数量是有可能增加的,即使这些国家的绝对贫困程度已然降低。但是,这样的结论并不比相反的观点更保险,不比忽视移民决策和行动的多重成因、忽视移民活动的性质以及迁入社会的同化过程的其他说法更保险。

国际移民:从理论上对社会科学提出的挑战

贫困和国际移民之间并无直接联系,这一事实使我们不得不对寻求规范国际移民的政策建议所根据的种种理论,重新评估。无需细做分析便已清楚的是,给国际移民提出解释并据以做出一般性或具体的政策建议的种种尝试,从根本上说都是从经济的视角观察问题,其理论基础都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以及相关的学术领域,要不就是取历史和结构主义的立场而带有新依附论的色彩。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基本上立足于劳动力的供求关系,认为国际移民乃是世界经济调整过程的一个部分,有助于提高全球范围的生产效率,因此

不应当以限制性政策或扭曲性的物质刺激而加以阻碍。

大量历史主义和结构主义的移民理论所持的观点虽然十分不同,结果还是同样地认为移民乃是资本主义扩张的后果,特别是市场、资本与技术的流通以及政治的国际化的后果。从这些宏观理论得出的实际建议,只能是没有任何政策意义的,除非它有力量改变世界经济制度。

这些经济理论互不相同,有一点却异口同声:都不同意用公共政策为工具来改变国际移民状况,这就不免具有反讽意味。前一个学派坚持认为国际移民只会带来暂时问题,市场一松绑则问题自然烟消云散。后一种理论断定在市场经济中这些问题根本无法解决。

对新古典主义和与之有关的经济理论应当从两个方面来批评。首先,它们仅仅关注永久性的个人迁徙而置其他行为主体和其他类型的移民活动于不顾。其次,它们也忽略了体制性的、历史的联系环节,以及不同性别和族群之间的差别。而历史的和结构的理论则是视而不见影响着移民同化的历史因素以及不同国家的国策。

还需进一步指出,以经济维度为研究的焦点,一般都忽视了社会发展未必与经济增长并肩而行这一事实。按照联合国开发署《人类发展报告 1999》所称,该报告涵盖的 174 国中只有 5 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其人类发展水平评级相当,有 92 国的人类发展水平评级高于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而 77 个国家的人类发展水平评级则低于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总之,发展的两方面的不平衡才是规律,这是对移民过程的任何比较性研究都不可忽略的。

纯粹的经济理论诸多缺失,已如上文所言:对多学科研究途径的需要于是应运而生。如我在本文之始就已强调的那



新到达的移民在太平梯上吃面条,见于纽约,1998年。Chien-chi Chang 摄影/ Magnum 供稿。

样,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全球化本身就是一种多维度的过程,所以需要采取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把各方面的结构和过程联系在一起,此外还要把种种客观因素以及主观的和文化的因素一并纳入作统筹考虑。如果我们打算以全球化为背景来考察国际移民现象,如果我们以改善当前的移民政策为自己的目标,那么,社会科学就必须制定足以理顺全球化过程与宏观、中观、微观趋势之间复杂联系的理论框架;因为移民活动何以发生,对迁出国和迁入国影响如何,对这种活动的政治反应又如何——所有这些都取决于这些联系。

传统上,人口流动从来都是人口学、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以及新近参加进来的政治学等学科的研究领

域。遗憾的是,共同的兴趣却没有导致多学科的研究或多学科的理论。事实是,直到新近为止,不多的几种对国际移民的经济学/人口学或社会学/人口学研究,都远远比不上用来研究其他社会人口问题如生育率变化的那些精致的观念框架。对生育率的跨学科研究可谓汗牛充栋。

寻找打破学科畛域、组织联合研究以确定更为全面而且能够实证的研究重点,乃是社会科学在国际移民研究中面临的一大挑战。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必先解决两个问题。第一,设法消除学科之内和之间在概念上的差异。这一任务绝非轻而易举,过去在这个方面的失败经验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单子。尽管如此,寻求新途径以达多

学科合作的事业,正经历所谓“复生更新”。途径之一是给国际移民制定普遍性的理论模型。第二个途径与第一个有关系,这就是以共同的框架为基础,提出种种多学科的研究项目,而此共同的框架则在分析研究的成果之上再加以精炼和丰富。途径之三是针对某一政策遭遇的具体问题组织一支研究人员和政策分析人员的多学科队伍,详尽探索该政策引起的后果。

通过实践,这些途径必然趋同。选择哪条途径固然会受到个人偏好以及相对而言的得失利弊的影响,但无论初始之际做何选择,随后必然发现其他两种途径同样也须采取。

把全球化和国际移民相联系的第二个问题是,同一地点同一时间发生形式不同、其社会经济原因与后果也各不相同的人口流动,重重叠叠、盘根错节。阐明这些互相重叠的现象,为其间的问题寻找答案,同样意味着必须采取多学科的视角以观察分析各种社会过程,诸如社会网络的出现和运转、社会资源之分布不均及其后果、政府干预不期而至的副作用之积累效应,以及居间者和族群社区群体的作用等等。

于是可见,多学科的视点与重重叠叠、盘根错节的问题其实是连在一起的。多学科的视点不但更易于解决,而且还能发现这类问题。既然它们有利于阐明极其具体的社会过程,所以从观念和实践上解决这类问题,就能比寻求普遍性发展模型的传统办法更加快捷。要确定此模型就需要弄明传统上分属各门各科的交互关系,这就不需要面对学科之间的权力斗争了。

国际移民:从政策上对社会科学提出的挑战

既然多个国家的政府和公民都把国际

移民视为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问题的根源,这一普遍现象就在这些国家的公共政策议事日程上占据突出的位置。人们或明或隐地要求政治家制定和实施某种政策来解决这些问题,避免今后重蹈覆辙,或至少是采取措施处理那些非处理不可的问题。换言之,国际移民构成了对公共政策的挑战。社会科学家如果不乐意看到人们固执偏见、先入为主,以至政策发生偏差,或于事无补或使局势恶化,那就必须面对这一挑战。

社会科学家能否协同应对这一挑战,取决于是否拥有相应的知识以及是否存在相应的渠道把有关的知识输送给决策者。换言之,取决于知识的生产以及知识生产者和可能的知识利用者之间是否存在有效的联系。

为国际移民政策生产切题的知识

什么样的知识对于国际移民政策算是切题?本文对此不做长篇大论而径直肯定一点:决策过程的不同阶段需要不同范畴的知识,或者说所谓切题既有质的不同又有量的差别。从广义上看,对于国际移民算是切题的知识包括以下几类:

描述性知识。涉及移民活动在迁出国和迁入国两处的趋势与过程,这一类知识的特点是将合法非法两种移民及其特征以及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化都加以计量化;就法律和行政方面关于移民的规章、移民的地位和权利以及社会和文化属性等等进行比较研究。这类知识多半源于单一学科领域的研究,例如人口学、社会学或法学。

作为移民问题的知识。关于国际移民的各种层次、趋势及其不同类型如何影响个人、家族、地理社区、社会群体以及民族等的研究,都属这类知识。就移民在迁出

国和迁入国对社会福利、劳动力和文化的影响进行的研究,不过是其中的几个例子。进行这样的研究需要人口学与至少另外一个学科的合作。这类的知识虽然总是直接关乎某一或某些具体的国家,但即使就某国而言不存在这类知识,人们仍然可以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或过去发生的事情进行推论,从而认识移民问题。

解释性、定量和定性的知识。就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考察影响移民趋势的成因和过程。和社科其他研究领域的情况一样,这一类型的知识构成国际移民领域理论知识的主体,是(说得平实些,应是)据以制订客观上和移民相关的政策的知识基础。评价其他政策和计划在移民问题上带来的意外后果时,也用得到它。

评价性的知识。借以评价公共政策、公共计划对国际移民的影响及其后果。

第一种知识无疑是其他知识的事实基础。因此,要求改进有关国际移民的定量和定性信息的呼声,是很有道理的。惟有这类知识不可用其他国家其他地区的信息来代替。这点和作为移民问题的知识不同,和关于移民原因的那类知识也不同。诚然,我们最好能够掌握经验性的知识,以便能够指出制订政策的那些国家的问题之所在,但大多数国家关于这些问题的知识往往都不敷应用。在这种情况下,就唯有利用从其他国家获得的知识,或基于尚属可信的理论而提出的假设。

简而言之,关于移民趋势及原因结果的知识必需大力加强,社会科学这才有可能为制订国际移民政策发挥作用。这一领域现有知识的主要部分,如同其他领域一样,存在于北方的移民迁入国。就拉丁美洲各国而言,除了从墨西哥到美国的移民算是例外,这类知识,尤其涉及国际移民活动因果的知识,都是不完全的。鉴于地区

内部移民活动达到了相对而言相当之高的水平,有必要建立一个人口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共同研究网络,分享知识和经验,促进与其他地区的同事密切合作以求应对国际移民活动提出的政治挑战。

为国际移民政策所用的社会科学知识

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是把现有的知识用于有关国家的政策制订。我们必需认识到,由于超乎国家之上的种种国际条约,国家已经失去了它的部分力量。它过去在经济和社会政策方面发挥的那种关键作用正在由企业和私人机构分享。围绕着国家的改革于是兴起了许多讨论。人们反复争辩的题目包括:权力下放、政府改革以及民主治理;以加强市民社会为目的的国家/公民新关系;议会和司法部门功能的变化;加强国家对公共和私人活动进行规范的功能;改革决策过程,使之更具有技术性。若要就社会科学知识应用于一般的政策或具体的移民政策做任何中期的考察,这些改革都是不可忽视的,因为它们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科学知识使用者所处的体制环境的属性及其组织功能。

还要再提出两个问题。第一,影响国际移民的许多政策都是经济或社会政策,它们都未曾留意上面说到的影响,而社会科学的潜在用户却分别在不同的部委和其他政府机构工作。其结果是,事情恰如不少跨功能政策遭遇的那样,交流问题以及组织上、政治上的内部争斗妨碍人们交换和共享有关移民信息。专业知识到头来反而往往成为官僚内战的又一种武器。

第二,我们需要认识一个简单的事实:国际移民过程至少涉及两个国家。这就意味着无论何方做出什么决定,双方都将受到它的影响。即使仅仅从双方利益冲突这一点出发,所有有关各国也应当平等分享

彼此获得的知识 and 情报,以期和平解决此类冲突。但就此而论事情也难逃常规:知识及其应用天然具有赋权的属性;因此,关于国际移民的知识之自由流通常常遭到事实上和法律上的阻碍,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一般地说,知识的应用既可能屈从于内部的政治过程,也可能屈从于外部的权势斗争。

另一个有趣之点是,现存的知识既可以抽象地运用,也可以作为一种工具运用。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政策总是有赖于某种概念的框架,借以把特定的事件界定为问题并据以选择最合适的解决办法。这类框架以即有的观念和常识为部分基础,而另一部分基础则是关乎社会的较为系统的看法;在当代,其中许多看法均直接间接来自社会科学。经验性研究确已发现,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成果在帮助广大公众和政策制定人员辨识问题上发挥着核心作用。

以拉丁美洲为例,考察一下那里国际移民政策演化的历史,便会发现五种不同的理论框架^⑪。第一种框架把问题归结为给该地区的经济提供劳动力这样一种需求。这个框架显然肇始于拉美的殖民时期,直到20世纪早期还在沿用。第二种框架着眼于为那些被认为空无人烟的地带招揽居民,显然盛行于从独立到20世纪早期。第三种概念框架的着眼点是为了保护拉美国家各自的政治、民族和文化特征,亦即精英阶层视为“民族之魂”的那些东西。这个观念至今仍为许多人所信奉。第四种框架的核心是要保护本民族的劳动力,因为据认为民族的劳动力受到了大规模移民的威胁。它从1930年代沿用至今。而第五种框架亦即最新的一种则据称正在围绕着地区和亚地区的整合而逐渐成形。

这些框架大多甚至全体都曾经包括并继续包括倾向于选择性移民的政策,作为其根据的知识当时都认为确实可靠。社会科学思想无疑仍被有意无意地用来建构这类概念框架。人们过去和现在最看中的,是处于主导地位的学科,以及该学科中最有影响的理论和方法论框架。目前,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在舞台上占领了中心位置。而多学科的概念框架,无疑将会导致较新也较为多样的政策。

需要提出的最后一点是要清楚社会科学知识目前以及潜在的使用者。这种知识用于国际移民政策,仅仅是一种复杂过程的一个部分,这过程涉及若干国家中的个人的、组织方面的以及政治方面的行为主体。一般说来,主要的使用者是各个国家的政治领袖和政府的决策者。但还有另外一类使用者,他们对前者如何使用这些知识确实发生影响。这些人包括技术性的顾问委员会、独立的学术中心、私家咨询公司、各个部委的专家机构等等。第三类用户是非政府组织,和政府比较,它们更为接近移民工作人员和社区组织,应该能够得到这方面的知识、参与这方面的行动。最后则是一般公民,应当通过各个层次的教育机构和媒体获得有关移民的信息,从而使得他们能够就此做出有意识的、有见识的决定;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从而培养和促进公民和移民之间的互动,以期推进移民之融入迁入社会。

简单的结论

无论我们喜欢与否,国际移民活动都将继续。人有自由迁徙的权利,对此我们还没有而且也许永远也不会有充分的准备。理解移民过程,确保来自不同地区和文化的人们和睦相处,对于当前这个新兴

的全球性社会是至关重要的。这也对社会科学形成重大挑战。提出挑战的问题形形色色,接受和应对挑战的也不能是一个国家一个学科。国家间、学科间的合作已经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因此,为这个目的

而建立必要的网络,借以改进数据的来源,举办比较性的研究项目以及应时变化的培训,都已是当务之急。

(陈 思译)

Notes (注释)

1. Castells, M. 1996.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Vol. 1: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Publishers, Prologue.

2. Bhabha, J. 1999. 'Belonging in Europe: Citizenship and Post-national Rights',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159.

3. UNDP, 1999.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3.

4. Population Division,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 1998.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levels, trends and what existing data systems reveal'. Paper presented at the Technical Symposium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Hague, Netherlands, 29 June-3 July 1998.

5. Rowlands, D. 1998. 'Poverty and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s

root cause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 critical assessment', as summarized at the Technical Symposium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Hague, Netherlands, 29 June-3 July 1998, p. 29.

6. Portes, A. 1998. 'Economic sociology and the sociology of immigration: A conceptual overview'. In A. Portes (ed.), *The Economic Sociology of Immigration. Essays on Networks, Ethnicity and Entrepreneurship*.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7. Simmons, A. B. 1989. 'World system-linkages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New directions in theory and method, with an application to Canada'.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Population,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Conference, 1989.

8. Simmons, A. B. 'Territorial mobility and time-space collapse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Fundación Bariloche, Centro de Estudios de Población, Seminar on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Population Mobility and Human Development, San Carlos de Bariloche, Argentina, p. 13.

9. Portes, A. op. cit.

10. Rich, R. F. and Caplan, N. 1976. 'Policy uses of social science knowledge and perspectives'. OECD Conference on Dissemination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Results, University of the Andes, Bogotá, Colombia, 9-12 June; Brunner, J.J. and Sunkel, G., 1993. *Conocimiento, Sociedad y Política*. Santiago, Chile: Libros FLACSO.

11. Marmota, E. 1993. 'Desarrollo Sostenido y Políticas Migratorias: Su tratamiento en los espacios latinoamericanos de integración', IOM, Latin American Regional Seminar, 22-26 March 1993.

移越来越多,表明迁移已经成为一种生存策略。地区内的人才流动越来越多,尤其是流向经济快速增长的核心地区;劳工移民日益为商业移民所取代。由于北方国家移民法越来越严格,移民们开始在本地区寻找去处。人口的迅速增长、经济低靡、战乱、政局不稳、贫困蔓延和失业增加,都表明未来几年移民,包括难民,可能继续增加。如果齐心协力协调国家法律和地区、次地区协议,次地区经济联盟有可能促进地区内的劳动力流动。

[黄 觉译]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国际移民动向 阿德拉 佩勒格里诺

本文考察了近几十年的国际移民动向,强调了拉美次大陆在以往 50 年间移民过程的特别之处。本文论述了拉美地区内移民运动的主要特点,以及 20 世纪后半叶的一大景观,即愈来愈多的移民流向美国。最后,作者探讨了国际移民的增加同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政治暴力对移民的影响,以及作为移民之首要原因的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作用。

[李存山译]

NAFTA 体系下的国际移民和劳动力 灵活性

亚利山得罗·卡那勒斯

本文为探讨 NAFTA 体系下经济一体化对墨西哥与美国之间移民的规模、成分和形式可能带来的影响,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我们以为,对移民的可能影响,不来自

自 NAFTA 之中,而是来自其背后的生产运作的变革。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墨西哥和美国采取了各种形式的劳动力灵活性策略,导致了劳动力市场形势的变化,而新形式的移民恰恰反映了这种变化。无论是墨西哥采取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还是美国实行的经济结构调整,都在经济和产业的日益一体化进程中,推动了两国间贸易关系的重组。从这个意义上讲,北美经济组织内部劳动力的流动,实际上更取决于各国以及共同体内工作过程之间、劳动力市场之间的联系,而非一体化进程本身。

[王 佩译]

国际移民、社会科学和公共政策 劳尔·乌尔苏亚

社会科学若要在制订国际移民政策方面发挥更广泛的作用,需面对几个问题。社会科学的这一新任务牵涉到两大过程:一是全球化;二是人权之在全球获得普遍承认。两者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对政策的抉择产生影响。新近的研究工作已经证明:有人认为自南向北的迁移与贫困直接相关,许多政策建议也源于这一认识,但事实却不是这样。作者指出,政策建议和研究发现相矛盾,因为移民政策倚重经济理论。但经济学其实并未虑及相关社会、政治和文化因素的复杂性质,而这些因素当然也影响到移民的动机和迁徙过程。故而作者提出组织多学科的理论研究,认为这应当有助于设计较为有效的政策。本文也主张区分知识的概念性应用和工具性应用。

[陈 思译]